



国史源

郇恒 著

齊魯書社

国史源

011 @eeequlip 薛轴千虫
07.80053 (1870) 心中薛营

郇恒 著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史源 / 郇恒著. — 济南: 齐鲁书社, 2015. 2

ISBN 978 - 7 - 5333 - 3245 - 7

I. ①国… II. ①郇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先秦
时代②中国历史—秦代 IV. ①K22②K2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7307 号

国 史 源

郇 恒 著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
电子邮箱 qilupress@126.com

营销中心 (0531)82098521 82098519

印 刷 山东天马旅游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5.625

插 页 2

字 数 392 千

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33 - 3245 - 7

定 价 49.00 元

本书由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助出版



本书研究国史所抱之态度

一、读史与做人，当齐头并进，融通为一。于历史中体会做人之道理，与做人中践行先贤之教诲。

二、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。老子云：“执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”对历史之研究，根本目的还是为当前人生社会服务，舍弃此目的，便落入学究主义之中，脱离了实际，变为屠龙之学。

三、正因史学之目的为作今日之借鉴，故治史之重点在于政治、军事与文化，尤其应注意治乱兴衰之大势。自历史人物之事迹中汲取经验与智慧，从文化演进之过程中激发民族之精神。至若于经济、阶层上连篇累牍，于故纸、典册间寻章摘句，皓首穷经，无益于世者，吾所不取也。

四、人类文明得以存在并发展之根本原因，在于有正义之存在。正义括囊极广，包括善良、公正、友爱、诚信、亲情、道德、尊重等诸多方面。伸张我民族历史上浩然之正气，对于铸造民族精神、培育民族气质、构建民族信仰，意义十分重大。

五、对历史上发生之事件与产生之人物，当作设身处地之研究，不可以今日之观念妄度古人，妄非古人；切忌纸上谈兵，坐而论道，要做到知己知彼、将心比心。

六、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历史人物大多有功有过，当分别来



看,不可一味赞颂或一味批判。在历史研究中,没有绝对主义,只有相对主义。

七、历史之前进,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。历史发展很少存在“必然性”,存在的只是“发展倾向”,认为历史之发展是单纯的不断“必然性”或不断“偶然性”作用之结果,都是不恰当的和不符合实际的。

八、历史上之种种道德、制度、关系、文化,皆为适应彼时社会之产物,并不能通行千古。吾辈切不可将现实社会丑恶与堕落之责尽诿古人,亦不可对古人所留之传统文化说三道四。须知,古人不可能料知后世之情况,更不可能预为筹划。传统文化中有精华,也有糟粕,关键在于取舍,此正吾辈责任之所在。

九、满招损,谦得益。个人如此,民族亦然。一个成熟伟大之民族,必对其本民族以往之历史抱自信之态度,且能对其他民族之历史与文化保持足够之尊重与理解。帮助推动本民族自信谦虚历史态度之形成,乃国史研究者义不容辞之责任。在这片领域,任何自高自大、目中无人或妄自菲薄之见解,都是对自己民族与国家之不负责任。

十、创新为社会进步之源泉,无创新则无新生物。世间万物莫不如此,史学亦然。本书在诸多方面颇有创新,其关键不仅在于形式,而且在于理念。诸如以上所述,尽乎是也。



本书缘起

余当童稚时，慈母亲为启蒙，授余汉字数百，及稍长，遂阅故事书、连环画，至今犹能不忘其大概。后严父自外还家，贻余《上下五千年》一部，盖林汉达、曹余章所编者也。父曰：“读完此书，汝即可为‘小博士’矣。”余闻言，即发奋于心，誓毕读之。时余方九岁，识字无多，此书凡三大本，近千五百页，数百万字，余时断时续，历一寒暑，始通读之，虽颇感费力，然读过后收获无量，正如武陵人入桃花源，初极狭而后开朗也。书中故事三百，至今吾犹历历在目，是书诚吾之历史启蒙读本，此吾不得不感佩于曹、林二师者也。

余家正堂挂《中国地图》一张，余三岁时即常对之发呆，幼童之智，自不识其地名，然心中隐然有一亲近感，正所谓“心有灵犀”是也。稍识字，遂辨其地名，默而记之，经年累月，乐此不疲，不数载竟熟稔图中之内容。至于县市之名，问之可答以某省；城市重镇，询之能对以详情。余今日犹叹，儿童真乃记忆力之黄金时期，彼真能达过目成诵之境界也。

因是之故，吾于历史、地理甚为热爱，后又喜绘“历史地图”，以一白纸摹中国之疆域，标以城镇，添以河流，俄而自创“国家”，划土分疆，心中臆想其征战兴亡之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摇首晃脑，陶醉其中，自得痴趣。

及至中学,虽学业繁忙,余仍寻购各色书籍,手不释卷,嗜之若醴,其中尤以历史、地理者为多。高一时购得原文《史记》一部,震于太史公之盖世才华与匠心独具,如饥似渴,吮其精华,废寝忘食,通阅是书。自此,吾之治史,有一榜样也。

大学之时,时光充裕,吾遂于专业学习之暇,徜徉于书海之中,遍阅所能经手之典籍,始知以往之自负,真如《秋水》之河伯,贻笑大方之家。于是益发愤阅读,举凡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科技、哲学、宗教、生物、物理、建筑、化学、天文、书法、影视、数学等,无所不爱,无所不窥,因是散吾之思,虽收广博之利,然失专攻之效。故自大一下学期,余遂集中精力,就所好之先秦入手,遍阅图书馆中所藏先秦史籍,此乃是书写作之基础。

余因遍观此类书籍故,深憾未有一部规模适中、文辞优美、博而能约、自由新颖之先秦断代史专著。现有之先秦史研究著作,或失之玄之又玄,故弄高深;或失之简之又简,不知所云;或失之俗之特俗,戏说胡吡;或失之堆砌文物,缺乏创新;兼之注重经济,轻视政治;注重考古,轻视典籍;注重人民起义,轻视伟人事迹;注重自然科技,轻视人文精神,遂使先秦这一吾国形成、吾族抟聚之源生历史,扑朔迷离,杂驳难认。(此为肺腑之言,诸君其恕狂悖之罪。)余不揣浅陋,乃立志著一心目中理想之先秦史,时大一下学期也。

然宏愿易发,实现却难。以余寡薄之知识,愚笨之智力,欲著是书,难于登天。此正余不得不边学边写,现学现卖,拖延三载,方才草成之故也。

盖余所敬慕向往者,乃民国之风度。彼民国之时,吕思勉、钱穆诸史家,不胜战乱流离,勇担文化重任,发愤著书,昌我文明,彼意志之坚韧、志量之高远,确乎令人心向往之,不胜钦服之至。而彼等所著之书,兼学术与通俗,富精神与温情,言辞典雅,令人读之口齿留香;格调高迈,使人读之热血澎湃,此正余所宗仰者也。余



自知无治学之才,然支撑余不离不弃,历三度春秋之努力终有以致之者,正惟追慕先贤立言救世之功业也。是故书虽鄙陋,或以致讥;然斯志有终,恐难非笑,此即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而执意著成此不合潮流之书之凭借者也。

成书之过程,既历三载,然以才薄识寡,而目标阔大,恐人私心相评,惹至讥议,畏于人言,故默而著之,三年旁近未知。直待是书草成之后,得恩师成积春教授之教诲,与齐鲁书社刘强老师之指点,方有以完成,在此亦深致谢意。



凡 例

一、本书记叙年代上溯中国原始人类出现,下至秦始皇完成统一郡县国家之创建,前后跨度凡百余万年。

二、本书分六编。第一编原始氏族社会,第二编氏族邦国社会,第三编统一封建社会,第四编封建郡县递嬗社会;第五编郡县社会,第六编思想史概览。

三、本书侧重政治、军事、人物、文化、历史、地理诸内容,于经济、科技、制度、典章等叙述较简。以使读者能于有限时间之内,通晓吾国吾民族发展兴起之大势,于纷繁复杂之历史事件中获得现实生活之借鉴。

四、本书对石器时代之划分,不唯西人是从,不以新旧而论,而是将石器时代看为不断进化之一体(因其社会性质始终未发生决定性之变化),故划分其为曙、早、中、晚四段,并分别与有巢、燧人、伏羲、神农等先圣对应,以显示我中华文明之独特魅力,以证明古史传说亦有其客观合理性,并非皆为虚妄。读者其稍察之。

五、本书坚持以春秋战国为吾国、吾民族文化性格之铸成期,因此于内容安排上,有所侧重;又因原始社会为吾民族之起源期,亦兼重之。本书意欲于有所侧重之叙述中,着力为读者展现我民族生成与文化奠基之历史,体现我中华文明之源远流长与博大



精深。

六、本书写作坚持学术性与通俗性并重之原则，立足社会一般文化水平之读者；力图避免只追求学术性而导致学究主义和为追求通俗性、媚俗大众而使历史庸俗化两种弊病。作者努力确保本书在通俗性基础上尽量使语言更有深度，更为典雅。

七、本书行文风格亦文亦白，仿民国风度。书中但凡可引原典者，不用己言；但凡可用文言者，不用白话。作者意图在此信息化社会中，为保存民族文化之种子，弘扬传统语言之习惯做微薄贡献。其中之文言，或有注解，或较浅显，吾敢确定凡在全民族文化水平平均线以上之读者，阅读绝无障碍。

八、历史虽无好恶，然治史者有好恶。故凡独立完成之著作，皆存作者自身之好恶、偏重，断无完全公正之可能，此书亦不能免。书中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之评价不可能做到全部公正诚允，其中也会夹杂一些作者自身之情感与态度，此为本书之特色，也是其灵魂所在，读者诸君请谅解。

九、书中夹注，言“恒按”者，为学术性之探讨与考证；言“卧云生曰”者，为作者对历史之感叹与评论，盖仿“太史公曰”之制也。

十、本书中凡不属于历史之内容，但为历史之延伸、总结、升华者，均以附论之形式出现。

十一、书中纪年以公元纪年为主，兼采年号、帝王纪法。

十二、本书多采古书以及论文、著作等先辈学者成果，因种类、数量太多，不一一注明，然参考书目皆于书后列出。

十三、书中观点，多系个人浅见，不带有官方及意识形态色彩。因观点产生之一切责任，均由作者一人承担。



叙 论

新会梁启超曾言：“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，曰中华、曰印度、曰安息、曰埃及、曰墨西哥。然彼四地者其国亡，其文明与之俱亡。今试一游其墟，但有摩柯末铁骑蹂躏之迹，与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场耳。而我中华者，屹然独立，继继绳绳，增长光大，以迄今日；此后且将汇万流而剂之，合一炉而冶之。於戏！美哉我国！於戏！伟大哉我国民！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梁氏此论，颇具激情，十分精彩。我中华的确是文明古国中生命力最顽强、延续最长久之国家。

吾国向以盘古开天辟地为国史之始。徐整《三五历记》载：“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。万八千岁，天地开辟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，盘古在其中。一日九变，神于天，圣于地，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丈，盘古日长一丈。如此万八千岁，天数极高，地数极深，盘古极长。”（《艺文类聚》卷一）此段神话，纯出想象，其中并无事实。据近世考古可知，我国已知最早的人类乃生活于云南北部金沙江畔之元谋人，距今约 170 万年。当彼遂古之时，原始先民茹毛饮血，赤身露体，跋涉于山林之中，仰息于自然所赐，生活艰辛，难以想象。然正惟此万等险恶之环境，激发出吾国先民不屈坚强之斗志，使吾国先民在与大自然之不懈斗争中，民智大开，持续进步，



终于奠定吾华夏民族之渊源与基础。

传说盘古之后,又有燧人、伏羲、女娲、神农诸神。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之术,使先民得享熟食之美味,摆脱腥臊之煎熬;女娲氏以泥造人,创夫妇之伦,并炼五色石补天,拯救生灵于水火之中;伏羲氏上察天文,下观地理,演绎八卦,建立人伦;神农氏亲尝百草,发明医药,播种五谷,教民耕作。燧人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即为吾国远古时代之所谓三皇是也。此等传说,虽可信成分较少,但亦能从一定程度上,反映先民生活进步之境况。大略燧人之时,吾国方处渔猎时代,故要发明熟食,以化腥臊。渔猎时代,未有夫妇之伦,正如《白虎通》载曰:“古之时,未有三纲六纪,民人但知其母,不知其父。”渔猎时代,所有权亦未出现,故而人民“饥则求食,饱则弃余”。这一时代,大约相当于吾国史上之北京人时期。到伏羲时代,吾国便进入游牧社会。因生齿日繁,食物短缺,便由山林之中,分散至平原之上,原先之群婚逐渐演化为固定婚姻,由此产生真正之家庭,家庭又聚合为氏族,立足于血缘基础上之“人伦”由此产生。此时期之先民,于生产生活之余,开始思考自身及周边环境之问题,由是有吾国最早哲学——八卦易学产生。《易·系辞下》载八卦之创造曰: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”先民探索之状,由此可见。伏羲氏时代,约略与山顶洞人同时。游牧社会之生产力,虽较渔猎社会为优,但仍十分落后,不足以养活逐渐增多之人口,吾国先民遂因天之时,分地之力,制耒耜,行农耕,吾国由是进入农耕时代,即神农氏时代。此时因多余粮食与产品之出现,人们互通有无,故而形成集市。又因农业对水利之依赖,而产生人民对集约组织之需求,故而有部落及部落联盟组织之产生。

传说吾国史上第一个部落联盟首领为炎帝,即神农氏。炎帝因其教民耕稼之伟大功绩,其氏族世代为华夏部落联盟之首领,历



五百余年。然至其末世,已不复有当年之威望,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:“轩辕之时,神农氏世衰,诸侯相侵伐,暴虐百姓,而神农氏弗能征。”此时南方九黎族方强,其首领蚩尤勇武善战,正积极北进,威胁整个华夏世界之生存。而中原因炎帝之威望跌落,共主不复存在,陷入群龙无首、自相残杀之危险境地。万幸有黄帝挺身而出,起而领导华夏民族,抗击蚩尤之北侵,遂有涿鹿大战之发生。

涿鹿一役,黄帝以诱敌深入,然后伺机歼之之战法,擒杀蚩尤,击溃其众,拯救华夏民族于危亡之中,挽天下狂澜于既倒之际。大战之后,黎族逐渐与夏族融合,黄帝成为各部落公认之首领,亦被后世尊为万世文明始祖。

自黄帝以至尧舜,为吾国历史之“前国家时代”,即“五帝时代”。黄帝以其伟大之功勋,成为五帝之首。黄帝之后,颛顼、帝喾继之。《史记》于此二帝,无什事实可述。大抵这两位君主,功业本不及黄帝尧舜,故省而略之。虽然如此,颛顼、帝喾时代,并非无所作为,只是彼辈处黄帝光芒之下,正所谓“星辰固不可与太阳争辉”是也。

尧舜时代,为吾国远古时代之极盛时期。当此之时,领袖人物英明神武,高风亮节,华夏民族不断壮大,生机勃勃,天下安定,人民乐业。先贤如孔子等心向往之,不胜仰慕,谓之“大同之世”。《礼记·礼运》载曰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,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;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,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,是谓大同。”

尧舜之时,洪水逆行,泛滥于中原,处于初创阶段之中华文明面临巨大考验。在鲧、共工等相继治水失败后,舜帝以禹为司空,总揽治水大政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叙述禹之治水曰:“禹乃遂与益、后稷奉帝命,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,行山表木,定高山大



川。……乃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。……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橧。左准绳，右规矩，载四时，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。令益予众庶稻，可种卑湿。令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。食少，调有馀相给，以均诸侯。”

由此可见，治水乃一极复杂、极艰辛之事。尤其处于当时落后之技术条件下，困难程度已非身处现代社会之吾辈所能想象。然而正是在此数十年之艰辛奋斗中，促进各族、各部落先民精诚合作，密切交流，推动国家之产生。故大禹治水实为吾国由原始氏族社会向氏族邦国社会过渡之里程碑。

大禹以平水征苗之功，获得中原人民衷心之拥戴，以崇高之威望，变禅让为世袭，开启家天下之历史，建立吾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——夏朝。吾国在经历了长期黑暗中之文明摸索后，终于走出一条辉煌灿烂的文明道路，完成自身之首次质变，成为地球上与埃及、苏美尔、印度并肩的四个文明古国之一。

夏、商、周三朝，即历代史家所谓“三代”是也。其中夏代历史因其年代久远，史籍记载较少而显得尤为单薄，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。甚至有学者认为夏朝纯属子虚乌有之事，系为后人杜撰。然近几十年来，不断有夏朝时期历史文物与遗迹之发现证明典籍所载之合理性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夏朝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。唯其不与传说完全契合而已。

商为东夷部落，汤时代夏而为中原之共主。商朝较夏朝，王权更为崇高、政治组织更加严密、武力更为强大、疆域更加广袤。商朝为当时世界首屈一指之大国。商代是我国统一集权国家之最初萌芽，处于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之过渡阶段。

商、周之际，是我国历史上之第二次质变。此次质变不同于前次：前次仅是国家出现；此次乃是社会整个层面发生变化，无论是其影响之深度还是影响之远度，皆远超前次。西周通过封建、宗法、井田三大划时代之制度创造，成功完成国家由氏族社会向封建

社会之转变。西周对中华民族之统一与传统文化之形成,实具奠基意义。

“西周的封建,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”(钱穆《国史大纲》),其得以良性运转之基础为共主强大、社会生产力落后与荒地足够拓殖,一旦共主实力衰微、生产力大幅提高、诸侯疆域相接而无地开垦时,就会走向解体与崩溃。在西周初期,周族诸侯面临实力强大、人口众多之商族残余力量时犹能团结一致,和平共处。但到商族与周族逐渐融合、共同之危险与敌人消失后,诸侯们便互相攻杀了。西周三大制度的崩溃,集中在幽王时爆发。

西周末年,犬戎破镐京,幽王被杀,平王于郑、申、鲁、许诸国拥护下,迁都洛邑,是为东周。东周时期,王纲解纽,诸侯相攻,五霸迭兴,七雄并立,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异常混乱、痛苦的时期。然正唯浴火之下,方能重生;正唯乱世之下,方显英雄,就像梁启超氏所言那样:“一统独立之国,务绥靖内忧,驯扰桀桀不羁之气,故利民之愚;并立争竞之国,务防御外辱,动需奇材异能之士,故利民之智。”(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)东周时代,实为吾国几千年来文化思想第一发达之时代。中华民族之文化传统、思想流派,皆原本于此时。此段历史,怎么书写其伟大都不过分。

七雄之一的秦国,通过商鞅变法,迅速富强。所谓“商鞅相孝公,为秦开帝业”(《论衡·书解》)。秦国积数代之努力,终于在嬴政时,扫灭六国,一统天下,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,完成了自商代即开始萌芽的集权国家事业。秦的统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质变,即由封建社会变为郡县社会。

秦因酷政速亡,汉朝代之。汉初承秦末之弊,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,统治者遂实行无为而治之政策,与民休息,使生产力得以逐渐恢复。至汉武帝时,凭借富厚之国力,东灭朝鲜,西通西域,南并南越,北逐匈奴。文治武功,达于极盛。有汉一代,四百余年,是

吾国历史上异常光辉灿烂之时期。汉朝国力之强大、疆域之广袤、文治之发达、武功之赫赫，实在令人心潮澎湃，激动不已。自秦代奠基的集权国家事业，至汉朝而进一步巩固；自秦朝完成国家民族之抟成，至汉朝更为分明，并最终赋予了族名，传用至今。汉朝完成了秦朝因速亡而不及完成的统一事业，将其发扬光大，并以其博大深厚而最终铸成我民族一体的灵魂与认同。

汉朝前期，尊崇黄老，但并不禁止其他学术思想之发展，春秋战国兴起之百家争鸣仍在继续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，为展开对匈奴之作战，急需统一全国思想，遂采纳名儒董仲舒提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从此，儒家思想走上宗教化道路，成为中华民族信仰之基础。汉武之独尊儒术，结束了百家争鸣的时代，标志着以郡县制、中央集权制与儒学一统天下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最终成熟，中华原生文明阶段结束了。